

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

高國抗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

高 国 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

高国抗 编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州广仁路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佛冈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593 字数371千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书号: 11343·1 定价: 3.50元

序

历史学的萌芽以我国为最早。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已有史官的设立和历史的记载。孔子编述的《尚书》和《春秋》就是取材于官府所藏的档案和各国的史料。《尚书》上起《尧典》，下迄《秦誓》，包括虞、夏、商、周的重要历史文献。《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记载，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迄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孔子撰述《春秋》，不仅依据鲁国的史书，而且又与左丘明参观各国的载籍，进行查核的工作。后世有人因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就认为孔子不是作《春秋》，而是整理鲁国的《春秋》而已。可是孟子就指明孔子作《春秋》（《孟子》第十四章），司马迁又说“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可见孔子确是做过一番补充修改工作。孔子也自称：“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如果孔子把鲁史原文照搬，没有自己的见解，又何必替此书负责呢？

世界各国流传至今的成文历史，自以《尚书》和《春秋》为最古。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而被称为“历史鼻祖”的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生于公元前484年，在孔子之后。作为史学家的孔子，应该位于世界史学家的前列。

史学史的内容包括史学评论和史学家的生平。早在周代，孟轲（公元前312至公元前289年）对《尚书》就提出评

论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第四十九章）《武成》是述武王伐纣之事。后世注疏家亦附和说：“言纣众虽多，皆无有敌我之心，故自攻于后以北走。自攻其后，必杀人不多，流血漂杵，甚之言也。”（《尚书注疏》卷一〇）这恐怕是史学评论的最早的一个例子。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孔子列入世家，为之立传，又在《自序》中表扬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和作用。我们可以说，中国史学家传最早是出于太史公之手。

综上所述，我国史学，源远流长。历史书籍，浩如烟海。清代乾隆《四库全书》收入的史部诸书，已有一万九千余卷，而《尚书》《春秋》这两种史书及其有关的著述被编入经部的也有二千多卷，当时其余未被收入《四库》的史籍亦难以悉数。近二百年来，我国出版的史籍数目又有成倍的增长。我国既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又有丰富无比的史学书籍，值得我们自豪，而且又为我们编写史学史的人，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可是在漫长的封建时期，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还没有形成体系，从事史学的人，以编纂历史为多，注释和考证历史次之，史事的评论又次之。至于探讨史学思想和方法之书，实是寥寥可数。唐刘知几《史通》二十卷，主要阐述史籍源流及其得失，即史学方法和史学评论。直至清代章学诚（实斋）著《文史通义》一书，才兼谈史学理论，即他本人自称为“史意”。近代张尔田（孟劬）的《史微》，阐明实斋“六经皆史”之谊，是其嗣响。由于时代限制，刘、章二氏的书，从内容来看，只侧重今之中国史学史体系的某些方面。不过《章氏遗书》似乎更进一步，不仅接触到史学思想和方法，而且对史学传统和史家生平及其成就均有所论述。虽然

未能对各时代史学发展进行综合论述和批判总结，但亦能承先启后，有开拓之功。

窃以为中国古代史学史在二十世纪初期才逐渐形成一门有系统的学科。吾师朱希祖先生少时留学日本，曾从章太炎先生游，传其史学，民国初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概论》，有讲义行世。以较新的方法来研究和编写中国古代史学史者，似以朱氏为最早。其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多种陆续出版，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很多特出之处，但方法谨严，体例完整，材料丰富，论断平实，涉及范围亦广，允为一时之冠。近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史专著已出版或尚待出版的不下十种之多。其中也有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编写的，殊为可喜。今天批判继承我国伟大文化遗产的呼声甚高，我们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进行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和编写，殆不容已。希望这类著作出版越来越多，“有如积薪，后来居上”。

1961年，我曾一度在暨南大学历史系担任中国史学史讲席，由于当时缺乏适当教材，不便于学习，在同学热烈要求下，我编了一部中国古代史学史讲义。这门课程规定一个学期讲授完毕，我的讲义也不得不在半年内写成，急就之章，卑无高论。这本讲稿二十年后才能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本治中外关系史，工作又多，教了一学期中国史学史后，就不复教。至八十年代初，重开中国史学史课程，由高国抗同志担任。高同志通过努力钻研和教学实践，撰成《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约三十五万言，将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高同志挟其书稿请我写一序言。我奉读之后，略陈鄙见。

此书在体例上基本按朝代划分，而把该朝代的史学家

及其著作一一评述，从而指出该时代的史学成就和特点。作者在该书的综合、分析和论断方面往往有其独到之处。例如，有文字的创造，才有成文历史的出现，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从三十年代开始，有些史学史专著已经把商代甲骨文的形成作为史学发生的前提了。但此书作者根据近现代的考古发现，认为文字的发生可以上溯到商代以前，而且起源于图画，并与图腾崇拜有关。换言之，是由于人类争取生存和改善生活而进行劳动生产而导致的结果。这样提法比较全面，对于初学史学史的人，自有扩大眼界，开拓心胸的作用。作者补缀之功，有可取之处。

作者谈到史官的产生，强调最早的史官是由巫或祝担任，即巫史合一或祝史合一，而巫祝又是氏族中受人推戴的优秀分子。事实上确是如此。因为巫祝虽然有他们消极的一面，如神道设教，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如利用他熟习的数学、天文、气象和文学知识来测量土地，指导农业生产。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巫师的权力很大，仅次于王。史官既由巫师兼任，地位亦高，对独行独断的君王有不便之处，因而发生过滥杀史官的事情。但一到春秋时代，巫祝或史官的权力一落千丈。统治者在“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借口下，拒绝重用巫师，以后便将不利于己的史册毁灭。许多史家退处一隅，不敢遇事直书，来保全他们的禄位。由于社会进化，民智日开，神权和神道事业也自然衰落。秦代“以吏为师”的专制措施，对史官和史籍都有很大打击。至汉代，史官地位继续下降，汉武帝时置太史公，司著作，至宣帝时改为太史令，行文书而已（《汉旧仪补遗》）。唐代史馆以贵臣监修，史官由其支配，史官难以发挥作用。刘知几三为史臣，郁快孤愤，只能私撰《史通》以见志。清初修明

史，执笔者如姜宸英等知名人士亦仅支七品俸，称翰林院纂修官，待遇也低。如果今后有人能对古代巫史合一和后来巫史分立的原因及时代，史官的势力和地位凌替的经过，以及史馆制度的变革和众手修史与私家著述的利弊等问题作深入有系统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编写可能会有很大帮助。高国抗同志之书对上述问题已有接触而未及畅论，我们希望他日后能够全面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

左丘明的《左传》是古代继《春秋》而起的最伟大的史籍。没有《左传》，《春秋》就不能流传至今。我们想知道春秋时代的史事，不能不求之于《左传》。《左传》影响之巨，非其他古代史籍可及。刘知几童年读《左传》，即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从此以史学为其终身职业。古来良史莫不工文，但总不及左氏行文的流畅易懂。高国抗同志此书，特辟专章而论《左传》，很有必要。他论述《左传》作者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及其超越前人之处，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人无间言。但在考证小节上，似还有可议之处。例如左丘明的生卒年月不可考，我们只知他与孔子是同时的人。而作者根据《论语》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句话，就说孔子自谦为晚辈，又说左丘明的年龄似比孔子大。这两句话只能说明孔子和左丘明二人意见相同，而不足以说明二人的年龄的大小和辈数高低。又左丘明好作议论，其中夹杂了一些预言，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变化往往加以推测，有偶然应验，亦有估计错误的。作为一个“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家，根据过去，把握现在，推测将来，事本寻常，何况左氏还有点好高骛远的“浮夸”习气。但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主观的预言往往不能符合客观的实际，《左传》中的预言有验有不验。例如“君子知秦之不复东征

也”，预言秦国日后之不振，不知恰恰相反，秦穆公以后至孝公及始皇而并吞六国，统一四海。这是以一时成败论事，缺乏远见的结果，而不是出于占卜。其中有应验者，也不一定是他人追补上去，因为其他人既不列名为作者，又何必弄虚作假呢？考证之学必须谨严，力避繁琐。古人说：“多闻缺疑。”这些小节细故，缺疑便可。

此书两汉史学一章体例颇为完善。作者首先论述一代的历史背景，文教政策，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思想（其中包括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以见史学和政治的关系，使读者对两汉史学的性质及其情况有一简括的概念。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的优劣，论者如麻，迄今没有一致的看法，或尊班抑马，或尊马抑班。郑樵认为班固昧于会通之旨，说“迁之于固犹龙之于猪”，实在抑扬过份。通史与断代史分为两体，各有特点，各人条件不同，不能要求人人都写通史，班固断代为史，无可厚非。平情而论，司马迁《史记》在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上有许多独创之处，天才横溢，议论精辟，文笔动人，远非班固可及。此书作者评论马班之言公允，“不隐恶，不虚美”，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此书论述列代史学各章，材料丰富，立论亦较为平实。惟论明代史学一章内容稍嫌单薄，要求亦似乎过高。例如作者说：在明代出版的史书中，竟难以找到一部有自己独创特点的，能独辟蹊径的作品。明人著述不少，我们不容易博览，恐怕不宜急下此断语。我国史体，如通史、断代史、编年史、通鉴体和纪事本末体等，在宋代已经完备了。在史学编纂上独创一种新的体系，谈何容易！清修明史，大张旗鼓，旷日持久，群彦如林，结果在史裁上没有突破前人，而在史断上也未有独创而精辟的见地。有清一代，只有《明

史》尚算长编巨著，除此之外，也找不到一部可以称为史学名著的作品，何必独责明代诸人。《元史》号称难治，因为蒙古势力，远及欧亚，研究元史的人要懂得一点西域和欧洲语文以及波斯及阿拉伯文，特别是中外关系史的知识，而明代修史的人不足语此。《元史》仓猝成书，有芜杂遗漏之失，但未尝没有优点。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二十九卷已详论之，兹不赘述。日后魏源《元史新编》、屠寄《蒙兀儿史记》及柯劭忞《新元史》等虽有整齐史料之功，文字修饰之力，也参考了一些西方资料，但卒不能夺取《元史》在史学上的地位。

其他史籍如何乔远的《名山藏》，张岱的《石匱书》，李贽的《续藏书》和谈迁的《国榷》等，均有一得之专长，中肯之议论，应在史学史中占相当地位。又明代历史笔记最多，是一代史学的特点。陶宗仪《輟耕录》三十卷，有稗掌故，现在成为很重要的参考书。又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工于纪事，长于文笔，允为此类的杰作。上列各书，如果我们能平心静气，实事求是，认真阅读，就可能有所体会，发现它的特点了。

明人著作多而流传较少，亦有一些原因。第一，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因触犯清廷的忌讳而受到焚毁。第二，由于晚明发生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关，战火蔓延，书稿遭劫，湮灭失传。第三，清朝的人对于明人的著述，往往轻视而加以丑低。清代汉学盛行的时候，以纪昀为首的考证学派无不诋毁明人，说他们空说理学，学无根柢，随意贬低明人一切学术成就，使明人著述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近人竟有随声附和说：“明人重八股，空虚浅鄙，八股外一无所知”，又说：“明人学问的空疏，历史已有定论。”明代立国二百七十六

年，如果全部知识分子除八股外一无所知，何以立国？而我国学术传统，岂不是中断了将近三百年吗？何以服人！

此书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编写工作。例如考察和根据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来探索和披露史学的发展；注意到经济基础和作为意识形态的史学的相互关系；运用《共产党宣言》中“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原则，对史事、史家和史籍进行科学的评价和总结；揭露王朝统治者利用史学作为统治工具，谴责封建主义专制政策和各种反动措施，表扬爱国的进步史学家。这些都是此书的优点。在此书中，史学发展的线索是相当清楚的。至于对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探讨和发现，还须共同继续努力。

作为一部中国史学史，在今天看来，应该包括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史学成就，换言之，除汉族外，我国少数民族的史学遗产都应该在中国史学史中占相当的地位。过去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实现。今天由于党的民族政策在各民族自治区正确执行，各方面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各种学校和研究机关已纷纷组织人力从事整理和翻译各民族的文献，其中当然包括历史著作。即《元朝秘史》一书，迄今已有三四种翻译和注释本出版。满文、藏文、蒙文和维吾尔文的史籍亦有多种译为汉文，可以提供编纂中国史学史的参考，有志者不妨一试。这是我个人的不成熟的建议。

中国史学史对学习历史有指导意义和作用，学习历史不能不学习史学史，正如学习文学不能不学习文学史一样。可是在高等学校中文系里，文学史作为必修科，而且教学时间有一年到两年的，而在历史系中，有些却还未能开设史学史，有些仅作为一学期的选修课。可见史学史这门学科还未得到

应有的重视。今后应该大力宣传其重要性，争取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成立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并积极培养有关教学和科研人才，多出一些史学史的专书和刊物，还须创造条件，进行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通古今中外之变，不仅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而已。大开风气，别开生面，承先启后之责，惟在我们史学工作者。这是我恳切的希望。

三十年代，我学习中国史，曾一度涉猎过中国史学史，但没有恒心，浅尝即止。到四十年代始，我从事“东南西北之学”，即世界史和中外关系史，头绪万端，未易悉理，更无暇涉及中国史学史了。今年逾七十，体力日衰，老牛破车，恐不能任重致远。高国抗君谬以我为识途老马，不耻下问，请我一序其书，而出版社亦加以敦促。我不得不杜门泚笔，为疏述其书的大旨并附以鄙见，以就正于作者和读者。

朱 杰 勤

于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七日

目 录

序	朱杰勤
---------	-----

导言	(1)
----------	-------

第一编 古代史学的萌芽创始——商至战国的史学

第一章 史学的起源	(8)
第一节 文字的出现——商代甲骨文	(8)
第二节 史官的产生和最初的史事记载——商代 史官及其卜辞	(13)
第二章 周代史官及其作品	(18)
第三章 我国第一部史著——孔子的《春秋》	(28)
第四章 左丘明的《左传》及《国语》	(38)

第二编 古代史学的确立和发展——秦至南北朝的史学

第一章 秦代史学简说	(56)
第二章 两汉史学	(59)
第一节 两汉史学概说	(59)
第二节 西汉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64)
第三节 东汉班固及其《汉书》	(93)
第四节 荀悦的《汉纪》和官修的《东观汉记》	(109)
第三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学	(120)

第一节	史学新地位的确立·····	(120)
第二节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南朝宋裴松之 的《三国志注》·····	(137)
第三节	南朝宋范晔及其《后汉书》·····	(151)

第三编 古代史学的繁荣兴盛——隋至元的史学

第一章	隋唐史学·····	(164)
第一节	隋唐史馆制度的确立及其作品·····	(164)
第二节	唐刘知几和他的《史通》·····	(180)
第三节	杜佑的《通典》·····	(208)
第二章	五代史学略述·····	(220)
第三章	宋代史学·····	(224)
第一节	古代史学的极盛时期·····	(224)
第二节	北宋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	(244)
第三节	南宋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	(273)
第四节	《资治通鉴》的接续之作·····	(276)
第五节	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的 《通鉴纲目》·····	(285)
第六节	郑樵和他的《通志》·····	(290)
第四章	元代史学及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318)

第四编 古代史学的迟缓发展——明清史学

第一章	明代史学略述·····	(338)
第二章	明清之际的史学·····	(351)
第一节	古代史学重放光彩的时期·····	(351)
第二节	黄宗羲和浙东史学·····	(356)
第三节	顾炎武及其《日知录》·····	(372)

第四节	王夫之及其史论·····	(381)
第三章	清代史学·····	(401)
第一节	清的文化专制及《明史》的编纂·····	(401)
第二节	乾嘉历史考据学综述·····	(419)
第三节	乾嘉时期的三部考史名著·····	(442)
第四节	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	(452)

导 言

史学史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它通过对历代史家和史著的分析研究，阐明史学的源流演变进程，揭示史学的发展规律。史学史的研究重点，是历代史家记述史事的观点和方法、历史上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以及历史编纂方法的演变等。这是历史科学中属于高层次的一门学科，它总结史学的发展，探索史学前进的方向。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梁启超云：“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①所以，阐述史学源流演变的史学史，也就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我国是自古就重视史学的垂训鉴戒作用的国家，至迟在商代已有史官的设置。自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就有了确切的纪年，有了逐年记载的历史。史著的出现也很早，即以《春秋》算起，至今也有两千多年了。两千多年来，我国的历史记载绵延不断，所有朝代，无不有史。这是世界上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于是史籍系统而繁富，体裁多种多样，仅被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就有三千二百四十九卷，共约四千万字。我国现存的古籍，估计有八万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界限笼统，内容多有重复交叉，其实古籍的“十之七八，可以归在史部”^②。所以我国史书的数量，确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第四章丑《史学史的做法》。

我们伟大的祖国，哺育出许多优秀的古代史家。他们爱国爱民，刚直不阿，治史严谨，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坚持“直笔”，反对“曲笔”，坚持写“信史”，力图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他们提出的许多史学观点，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芒。他们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史书体裁，不断地把历史编纂方法推向前进。古代史家们艰苦卓绝的劳动，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我国古代史学的伟大成就，是世界各国中所罕见的。梁启超有云：“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①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商至战国时期，产生了文字，设置了史官，出现了孔子的《春秋》和左丘明的《左传》，创立了编年体的史书体裁。这时，史学鉴往知来的重要作用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历史知识突破了官府独占的局面逐渐推广到一般知识分子之中。但是，在这一千多年中产生的历史著作很少，史家更少，体裁也只有编年体一种，其他编纂方法还在萌芽之中。对于社会历史演变的原因，发展的动力，基本上是以讲天道鬼神的唯心史观来解释，蒙着一层厚厚的神学灰尘。在这一时期修成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史著，但当时被看成是表述儒家思想的著作，属于经学的范围，人们专在其“褒贬善恶”、“微言大义”上下功夫，不是当作历史来研究。至于《左传》则被认为是《春秋》的附庸，也是被当作经学来学习的。所以史学作为一门学问来说，这时还未形成，它还处于萌芽创始的阶段。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东汉班固撰《汉书》，确立了纪传体的史书体例。从此纪传与编年二体并行于世，史以纪传为正。但在东汉以前，史著的数量仍然不多，在图书目录中还不能形成独立的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